

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国际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Горбачев-Фонд)

奔向自由

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领导干部参考译丛

奔向自由

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李京洲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5

ISBN 978-7-80211-351-0

I. 奔...

II. ①俄... ②李...

III.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俄罗斯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5346

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

出版人 和 龔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 66509366(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680×980 毫米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5.75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编者的话

由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国际基金会（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纂、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的《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 20 年后的评说》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

细心的读者或许不会忘记，16 年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横跨欧亚两大洲、幅员辽阔的大国强国——苏联解体，这一事件已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源地的苏联解体的原因会被永远追问：号称“超级大国”的苏联，为什么在“无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间分崩离析？为什么作为拥有千百万党员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面对将被解散、执政地位即将丧失乃至被宣布为非法这样一些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时，没有组织任何形式的有效抵抗？为什么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党面临威胁的情况下，不从大局出发，挺身而出维护党的团结，而是率先宣布与党决裂，另立门户，网罗组织起新的党派？苏联解体的内外因是什么？苏联几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甚至献出生命的理想何以瞬间灰飞烟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拯救社会主义的“龙种”，还是葬送共产党的“跳蚤”？认真研究、反思这些问题，对我们不无裨益。

确实，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开放”和“改革”的始作俑者。那么，又

是什么原因促使戈尔巴乔夫推动“开放”和“改革”的呢？十几年过去了，目前国际乃至中国对当年苏联解体原因的说法仍莫衷一是，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亦有着各自的观察角度，对此解释亦各执一词。

本书的议题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拟定，当时事件的参与者或亲历者应邀从当事人的角度，在20年后对戈尔巴乔夫当年领导并推动的改革进行分析和诠释。书中收录了20多篇文章，作者中有曾在戈尔巴乔夫政府中出任要职并具体领导、设计、推动和实施改革的官员，有当时担任戈尔巴乔夫改革理论和政策顾问的专家学者，有当时苏联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和研究人员，有当时驻苏联的英美大使，还有国外长期从事苏俄问题研究的知名专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当时都极力推崇并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和措施，迄今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持肯定态度。本书集中反映了目前俄罗斯和国际问题专家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流看法，为我们了解戈尔巴乔夫改革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正如戈尔巴乔夫在“致读者”中所说的那样，本书“不是把某种特定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对各种评价和事实加以比较性思考”。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从本书当事人的叙述中了解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进程。不仅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过程，了解戈尔巴乔夫改革理论和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实施过程，了解戈氏改革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方式方法对苏联走向解体的影响，而且作为政治发展过程，了解当事人在20年之后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始料未及的后果所进行的认识和反思。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是支持并参与戈氏改革的亲历者，均得出结论认为，戈氏改革的初衷是好的，改革过程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机会避免某些失误，他本人也能够以非常的手段制止某些人的操纵。因此，有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始料未及，完全是一个“被出卖了的改革”。那么，我们自然要问：戈氏改革是如何被出卖的？是被谁出卖的？既然被出卖了，那么买家又是谁？

我们更希望中国的读者在研究分析苏联的经验教训过程中，尤其是在分析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更深刻地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和措施选择进行反思。苏联经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脱胎于苏联传统体制（经典体制），曾经困扰苏

联当时改革的问题，也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关键问题。所以，仅把这些问题作为一般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和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对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给出答案和对策，这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也是我们将本书列入“领导干部参考译丛”的初衷。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5月

致读者

自我国历史中被称作“改革”的那个悲剧性阶段开始后，已经过去了20年。

2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依然在问：当时苏联是否需要改革，苏联的改革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那些使改革中止并导致苏联解体的不幸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吗？改革给苏联社会和世界带来什么，留下了哪些遗产？

俄罗斯目前社会政治形势特点表明这些问题具有新的现实意义，而且已摆在后改革时期步入独立生活的年轻一代面前，并迫使人们不断对1985—1991年间的事件进行思考和作出评价，因为正是当时席卷全国的解放浪潮奠定了我国社会民主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础。

我所领导的研究基金会邀请了当时事件积极参与者或亲历者——一批俄罗斯和外国学者和活动家，从今天的角度对这些事件作出分析或诠释。许多人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有了本书。书中收入了20多位作者的文章，作者中有俄罗斯科学院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有在改革年代担任要职的外交官，有原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有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研究人员。

作者包括：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和副院长亚历山大·涅基佩洛夫，俄罗

斯科学院院士奥列格·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院士尼古拉·什梅廖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国外著名斯拉夫学研究专家史蒂文·科恩（美国）和阿尔奇·布朗，原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阿纳托利·阿达米申，原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原英国驻苏联大使罗德里克·布赖特韦特，先后担任过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助理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俄罗斯著名学者和政论家瓦季姆·梅茹耶夫、利利娅·舍夫佐娃、德米特里·福尔曼等。

读者所关注的无疑不仅有收入本书文献的多样性，还有书中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具体评价，因此本书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它不是把某种特定的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对各种评价和事实加以比较性思考。

本书收入了基金会研究人员撰写的分析报告《二十年后看改革》。收入本书的社会学述评无疑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在这些述评中援引了 1985—1991 年间就西方和苏联公众对改革的态度所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的结果（奥·米·兹德拉沃梅斯洛娃的文章），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在米·康·戈尔什科夫和弗·瓦·佩图霍夫领导下完成的关于当代俄罗斯对改革的理解的详尽研究的结果。

我希望本书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苏联改革倡导者的意图和行动，能促进对 20 世纪我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这一伟大事件的进一步反思。

米·戈尔巴乔夫

目 录

致读者

第一部分 1985—1991 年改变苏联和世界的七年

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 3

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博士，教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顾问，起草班子负责人；1985 年任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1986—1990 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8 年起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1991 年为总统委员会成员，苏联总统高级顾问）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 18

史蒂文·科恩（纽约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

改革与五个转型 38

阿尔奇·布朗（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

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 57

亚历山大·加尔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教授；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课题研究中心课题负责人；1985 年任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社会政治发展室主任，1987 年起为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 75

维克多·库瓦尔金（“鉴定”圆桌会议（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执行干事，历史学博士，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和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教授。1989—1990 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1991 年任苏联总统助理顾问）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 97

亚历山大·维贝尔（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人员，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历史学博士；20世纪80年代任苏共中央国际部顾问，1990—1991年任苏联总统助理顾问）

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 116

鲍里斯·斯拉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助理。1985年任中央教师进修学院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哲学博士，教授。1987—1991年先后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真理报》政治评论员和编委会委员）

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1985—1991年） 137

[美]杰克·马特洛克（美国著名外交家；1983—1987年任里根总统与苏联关系问题主要顾问；1987—1991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第二部分 关于时代和个人

“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 157

亚历山大·涅基佩洛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改革初期曾任俄罗斯科学院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所（1990年前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室主任，后任副所长、所长）

历史的转折：一个目击者的思考 167

奥列格·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所荣誉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顾问；在改革年代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所长；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

并非一定要流血 177

尼古拉·什梅廖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教授，经济学博士；1985—1991年为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室主任；1989—1991年为苏联人民代表；1991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这美好的三年 189

阿纳托利·阿达米申（大使，已退休（1998年起），欧洲大西洋协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教授；1985年任苏联外交部第一欧洲司司长，

1986—1990 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1990 年 5 月—1993 年 1 月任苏联(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	
戈尔巴乔夫与改革:咄咄怪事之反观	204
罗德里克·布赖特韦特 (1988 年至 1992 年英国驻苏联和俄罗斯大使。后任英国首相约翰·梅杰的顾问。著有回忆任驻莫斯科大使时的回忆录《穿过河流》)	
应该继续下去	214
瓦季姆·扎格拉金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顾问,哲学博士,教授;改革时期任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秘书,苏联总统顾问)	
新思维的过去和将来	227
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研究人员,课题负责人;改革时期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问题助理,后为苏联总统助理,苏共中央委员)	
弦外之音?	234
帕维尔·帕拉日琴科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国际联络和与报刊联系部门负责人。改革初期为苏联外交部翻译司工作人员)	
与历史争论到底	251
安德烈·格拉乔夫 (世界政治论坛(意大利都灵)学术委员会主席,记者,政治学家;曾任苏联总统助理和新闻秘书)	
未竟事业之新开端(改革之我见)	259
格奥尔吉·奥斯特罗乌莫夫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工作人员,“克里姆林宫之后的戈尔巴乔夫”课题负责人;1989—1990 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秘书;1991 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苏联总统秘书处秘书长)	
二十年后看戈尔巴乔夫改革	280
瓦季姆·梅茹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哲学博士,教授)	
人文科学工作者眼中的戈尔巴乔夫改革	287
德米特里·福尔曼 (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教授;改革时期为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不要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横加指责! 304

亚历山大·齐普科 (《文学报》评论员;改革初期为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1986—1990 年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顾问)

二十年之后..... 314

利利娅·舍夫佐娃 (卡内基争取国际和平基金会后共产主义架构研究计划负责人、主要研究人员,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直属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改革初期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第三部分 社会舆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反映

西方和苏联社会舆论对改革和“戈尔巴乔夫因素”的看法

(1985—1991 年)..... 323

奥丽加·兹德拉沃梅斯洛娃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社会政治中心负责人,哲学副博士;改革初期为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俄罗斯人二十年后看改革 343

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所长(2005 年6月该所与社会学所合并,同年任社会学所所长。——译者注),哲学博士)

弗拉基米尔·佩图霍夫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社会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哲学副博士)

附 录

二十年后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381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

第一部分

1985—1991 年 改变苏联和世界的七年

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

瓦季姆·梅德韦杰夫

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

史蒂文·科恩

改革与五个转型

阿尔奇·布朗

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

亚历山大·加尔金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

维克多·库瓦尔金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

亚历山大·维贝尔

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

鲍里斯·斯拉文

从华盛顿看到的改革（1985—1991 年）

杰克·马特洛克

改革曾有成功的机会

瓦季姆·梅德韦杰夫

今天恐怕没有人敢否认 1985—1991 年的改革是我国和世界当代历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对这一改革的评价大相径庭——从肯定甚至盛赞到批判甚至极端否定。前者主要出现在世界舆论中，而后者大多来自俄罗斯学者和俄罗斯大众意识。

对这一奇怪的现象很难作出解释。世界公正地认为，新的政治思维，“冷战”的结束，军备的实际削减和人类得以避免世界热核灾难的威胁，两德统一，阿富汗冒险以及一系列其他地区冲突的停止，当然，还有我国发展走上当代民主进程的轨道，所有这些无不与这一改革有关。这一切过去和现在自然都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

在国内，对改革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之后所发生的深刻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影响。苏联的解体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降低以及随后俄罗斯的政治动荡、两次车臣战争、人民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俄罗斯社会明显的财产差别、社会上相当一部分领域或者说主要领域的犯罪和贪污受贿活动猖獗——这些都被视为改革的直接后果。古罗马人早就认为，“之后”并不等于“因此”，社会舆论的突变是有其规律的，而且有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定种种事件的真正联系。

对改革评价的明显分歧也反映在近 10 年来问世的大量出版物中。我对所有这些复杂问题的观点和看法可以在我这几年发表的四本书^[1]以及大量小册子、文章、报告中见到。在本文中我不想重复已经说过的东西，看来重要的是就对改革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释中形成的某些成见谈谈看法，

既不奢求全面，也不奢求没有争议。

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中断的原因

1985年春开始的改革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或者确切些说，改革的准备阶段）是1985年春至1986年年底这段时期。第二阶段（实际开始改革的阶段）——从1987年年初至1988年年中。第三阶段即高潮阶段——从1988年年中（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至1990年年中（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阶段——从1990年年中至1991年年底。改革最终因1991年的叛乱^①、苏联的解体、向雪崩式经济改革的转变而中断（在附表中对改革的各个阶段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

关于改革中断和改革领导者失败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按照其中一种相当奇怪的说法，认为苏联当时的改革作为民主改革进程预先就注定会失败，因为苏联社会根本无法改革，旧的制度已经僵化，应当将它摧毁。俄罗斯似乎已经走过了自己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极点和顶点，接下来必然要走下坡路。俄罗斯民族由于在20世纪遭受的种种动荡，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备受折磨，因此，这次改革是一场最大的历史悲剧。这是使国家走出历史绝境的一次前途渺茫、异常艰难的尝试，戈尔巴乔夫也遭受了与所有伟大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同样的悲剧命运。

可以理解那些有如此看法和对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情的人的心情，但不能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因为这种带有历史宿命味道的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个人是让国家去做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一件实际上没有成功机会的冒险。

大多数关心苏联的研究者和思维健全的人都认为，改革对于摆脱过去的威权主义残余的影响、为国家开辟通向未来的道路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它开始得太迟了，因而遇到了大量的困难，而改革的领导者又没能估计到和克服这些困难。此外，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操之过急，太热衷于开

^① 指1991年苏联8·19事件。——译者注

始和进行改造，没有考虑到苏联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并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另一些人的看法正相反，认为他行动过于谨慎，在放弃过去的东西、摧毁社会主义的种种架构和使国家重新投入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怀抱方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魄力。

当然，在改革过程中国家政治领导有不少失误和错误，关于这些失误和错误下面会谈到。然而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我想强调其中的一个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评价。这就是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世界经济局势，特别是对世界石油价格的依赖。由于西西伯利亚石油开采量不断增加和世界石油价格持续攀升，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未将天然气、其他自然资源及其初加工产品计算在内）收入达到每年 200 亿美元。提及这一点对于认识俄罗斯目前出现的与上世纪 70 年代有些相似的局势十分有益。

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世界石油价格发生了“反向革命”，价格下跌了 66%—71%，这使得来自外贸的外汇收入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采用了近 5 年的平均价格而得到缓解。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 5 年这一因素也不再存在，于是我们开始陷入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债务之中，1989 年国家的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逆差，包括粮食和其他商品在内的进口也产生了巨大的困难，这对国内市场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不能不承认，当时处于石油针尖上长达 15 年之久的我国财政状况的根本改变并未立刻被意识到，困难被看做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利用过低的美元汇率所作的官方统计没有切实说明这一因素在我国经济中的意义。实际上，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在世界市场上的销售保证了 10%—15% 以上的国家收入和四分之一以上的预算收入^[2]，以扩大石油出口来补偿价格下跌的尝试没有成功，此外，石油开采量也正是在这几年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再加上居民货币收入和货币流通量毫无道理的增加，便造成了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极为不利的环境，尽管生产增长在 1989 年仍在继续，但消费市场形势开始急剧恶化。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停止政治改革，甚至放慢政治改革的速度，已经不可能了。至于种种经济改造，则应当首先突